

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

王璐婵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进入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景观策略进一步表现为数字景观的秩序建构和日常生活展演。这种数字景观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层面分别表现为自由与垄断、民主与专制、多元与单一、融合与分离的悖论。而中国在数字时代走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文化和数字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出发,整体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人本发展逻辑为核心实现了对西方景观社会以资本增殖逻辑为核心的超越。这种超越具体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人民当家作主对统治阶级专制的超越、文化自信对价值规训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社会内在分离的超越。在当下,坚持这种彰显中国特色和优势的超越性,有助于我国以数字化驱动引领现代化发展,对加快“数字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景观社会;数字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6)04-0035-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60404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研究进展

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既具有一般共同特征,又具有基于自身历史文化与国情社情的独特之处。当前,对比研究中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既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参考和借鉴,也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优势,推动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团结奋斗。

当前,学界关于中西方现代化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根基、基本特征、价值意蕴、逻辑理路等方面。韩庆祥、张健认为西方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主客二分”,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根基是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1]。骆郁廷、肖天乐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跨越西方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马尔库塞陷阱”“库兹涅茨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和新愿景^[2]。廖胜华认为在现代性的价值主体、价值旨归、政治形态等命题上,中国理念和西方理念具有明显差异^[3]。周梅玲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从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发展逻辑和文明逻辑等维度,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困境^[4]。

收稿日期:2025-09-12

作者简介:王璐婵,女,法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数字时代下中国式现代化对景观社会价值悖论的超越”(24SKJD076)。

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审视中西方现代化的差异具有重要启示,但仍存在一些缺憾:一方面,立足数字化时代语境的专项对比研究较为缺乏;另一方面,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的分析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数字化视角出发,基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分析当前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景观的秩序建构和日常生活展演,同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分析“中国式”数字化的发展进路,进而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性探究,为当前中西方现代化的对比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启示。

二、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现实悖论

德波意义上的景观是由图像、影像和事物的意象化图景整合而成的表象集合。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消费社会阶段,德波认为马克思和卢卡奇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已经升级为由巨大商品积聚而成的景观社会,这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物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颠倒为表象之间的虚假社会关系。作为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当下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意味着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愈发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与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相关的资产阶级景观谋划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即数字景观。这种数字景观经由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所赋予的时代特性遮蔽了其背后遵循的作为景观一般的真实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数字景观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个维度的现实悖论,具体来看,可以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四个维度展开。

(一) 经济悖论:自由与垄断

景观作为一种“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images-objets)的先进经济部门”^{[5]7},是资产阶级借以积累资本和剥削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景观的这一特性在看似更为开放、包容、多元、自由的数字化市场中得到更为隐蔽且肆意的施展。不可否认,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确实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和市场环境,推动了互联网新型初创公司的涌现与发展,带动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的迅速发展,造就了大批新型数字劳动从业者。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构建起的数字景观则借机营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多元、公平的市场竞争局面,但实则这种自由是表面的、虚假的、稍纵即逝的,因为数字资本主义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必然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的内在运行规律,反而加速了垄断现实的到来。在数字景观中,这种垄断局面是以平台资本主义的形成为标志的。数字平台作为数据的提取装置,其规模的大小、盈利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所拥有和掌握的数据量,这就意味着各种平台在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数据的瓜分问题。平台吸引的用户越多,获取的数据流量就越大,收益就越大,平台规模也会随之扩大,从而吸引更多的用户和流量。垄断平台的形成会比资本主义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迅猛且彻底地挤压自由竞争阶段的同业经营者生存空间。因此,在数字景观中,数字化市场的自由竞争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泡影,“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垄断的趋势是建立在平台的DNA上的”^{[6]106},没有“数据—流量”这一经济模式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平台会在迅速成为头部平台垄断扩张的牺牲品,数据、算法和流量成为垄断平台把控市场的权力密码,更多的数字资源被少数垄断平台和资产阶级所掌握,市场要素分配、剩余价值剥削、贫富差距等问题愈发严峻。

(二) 政治悖论:民主与专制

赖特·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末指出:“美国当前的民主主要是形式上的,以及对民主期望的修饰。而实质上与实践中,常常是非民主的,在许多制度领域,这已是再明显不过了。”^{[7]204}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德波指出景观作为一种隐秘的政治统治工具,“具有统一和集权的性质”^{[8]4},资产阶级借助景观维持的正是表面上看似民主、实则充斥着控制与专制的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景观发挥着一种宣扬形式民主和修饰民主期望的作用,为资产阶级实施控制与专制提供了现实土壤,从而实现“对少数个人利益(主要是资产阶级个人利益)的保护”^{[9]165}。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

入到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数字景观则“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工具,为那些试图扩大数字资本主义势力范围的人提供了一把利剑”^{[10]92}。在数字景观的总体性表象下,景观民主披上了数字化、信息化与网络化的外衣,大众的民主权利似乎得到了更多保障,看似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监督权,权利的行使也更加高效便捷。但从根本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在数字景观遮蔽下表象化的伪民主,是资产阶级在数字时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所采取的策略性民主,其目的在于实现一种隐蔽而不自知的政治服从,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数字专制。这主要表现为:首先,通过利用数字景观的监控智能化特征,资产阶级统治者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福柯式的全景式监狱,实现了对民众更加直接高效的监管和控制;其次,资产阶级统治者借助数字景观巧妙地转移社会矛盾,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网络视觉奇观中,沉溺于信息化营造的符号洪流之中,从而进一步控制舆论走向;再次,资产阶级统治者借助数字景观加强政治推销,通过制造数字媒体奇观,政治公众人物将自己塑造成为数字景观中的一部分,以此向公众推销自己,进而达成自身的政治目的;最后,资产阶级统治者借助数字景观进一步集中权力、强化等级制度,在网络空间这个看似民主的新型公共领域之中,话语权实则愈发集中到在数字景观背后进行操纵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手中,进一步强化了等级秩序在网络空间中的建构。这些都表明,“所谓的‘西式民主’只不过是资本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借助大数据操控社会大众的工具”^[11]。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真实目的在于通过伪民主的手段,将更多的人纳入数字专制范围之内,从而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其政治统治。

(三)文化悖论:多元与单一

在德波看来,景观作为一种杰出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对真实生活的穷困化、奴役和否定”^{[5]136},是资产阶级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进一步以电子屏幕为中介,爆发式输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使得互联网用户和数字消费者被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统治策略所裹挟。从客观层面上看,数字时代确实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大繁荣,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推动着人们的思想和理念更加自由开放。在数字景观的总体性表象之下,人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充满多样性、多元化的自由、开放、丰富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而这种文化的多元繁荣与思想的自由开放只是资产阶级借助数字景观的表象化展示,其借助文化渗透与价值规训塑造“单一化”“单向度”的文化样态,才是数字景观文化意识形态统治的真实目的。一方面,在数字景观中,资产阶级统治者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监控,实现对数字用户的个性化驯化,进而培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拥护者;另一方面,面对每天被推送的海量信息与知识,数字用户习惯于相信眼前看到的就是好的、真实的、正确的,人们对呈现在眼前的数字图景习惯于抱以肯定和顺从的非反思态度。长此以往,个体的反抗意识和批判精神会在数字景观万花筒的麻醉中逐渐被消解。当数字用户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和无思状态的肯定者时,这就意味着受虚假意识支配、丧失本真意义的欲望主体就此生成。这种虚假意识和伪欲望表明个体所表现出来的需求和欲望并不是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而是被数字景观所操纵和支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数字资本权力作为“一种无所不在、潜移默化化和毛细血管式的规训权力”^[12],使得个体不断通往“焦土地带”。

(四)社会关系悖论:融合与分离

在德波看来,景观是以图像为中介而建立起来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5]10},资产阶级则可以借助这一点来加强对社会关系的操纵和控制。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景观的秩序建构和日常生活展演把人们纳入一个个虚拟共同体之中,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即时性和地域性使得社会交往成本急剧降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和社会联系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便捷和密切。这在客观层面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社会关系的广泛融合,前数字化时代具象的面对面社交正在被抽象化为电子屏幕前数字用户的一

条条网络消息。一方面,这种网络消息以即时的、符号化的、会意的方式将人们融合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之中,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和社会联系;但另一方面,这种交往和联系所带来的融合更多只是量上的增加,而非质性上的超越。因为这种融合本质上是原子的、分散的、随机的、浅薄的、易瓦解的,在数字景观的粉饰和遮蔽下,这种融合会在无意识之中走向自身的反面,带来更深度的社会分离。这种深度的社会分离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它意味着主体自身同一性的分离,由于数字景观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网络带来了主体地位的丧失和个体本质的遮蔽,主体将逐渐丧失人之为人所应建立健全的内在同一性;其次,它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离,这种以电子屏幕为中介的交往,将人们塑造成为一个戴着装饰面具的“游戏玩家”,将哈贝马斯意义上理想化的社会交往活动降格为虚幻的、表象化的、非发展性的伪交往活动;最后,它还意味着主体日常生活本质的分离,在数字景观的现实统摄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同时,却也丧失了其应有的内核与本质。真实的体验、感悟、享受与热爱逐渐消解,而缺憾、浅薄、冷漠与孤独正在弥漫成一种主流。日常生活的意义在数字景观所编织的幻象世界中逐渐被磨灭平棱角、渐行渐远,具有社会性意义的日常生活集体空间被扁平化和原子化为一个个孤独的深井,其中漂浮着一个个无根的数字主体。

三、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路

数字化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数字化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既是顺应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客观需要,也是回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依靠数字化推进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不同于西方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路,我国数字化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导向,始终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大力推进“数字中国”这一核心战略引擎建设,“将现代化规律与中国国情深度结合,清晰回答了中国何以现代化的路径之问”^[13],走出了适配本国国情、彰显时代特质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种以数字化为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遵循全面系统的发展思路,从数字经济、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数字文化和数字命运共同体建设等方面整体推进。

(一)以数字经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根基

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立足以人民为中心,服务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居于决定性地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591}。在数字时代,经济建设依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环节,并且这种经济获得了数字化的表现形式,以数字经济的新面貌与传统的实体经济一同致力于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现实发展来看,“数字经济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数字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抓手”^[15],“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特征”^[16]。我国数字经济在党的领导下,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字技术实力为基础,遵循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共享社会发展福利”^[17],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大量新兴产业,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数字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和普及,推动了数智化、智慧化生产生活的全面普及。这些新兴产业极大带动了创新创业,“通过扩大就业岗位、缩小收入差距、优化产业结构等途径促进共同富裕”^[18]。同时,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需要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数字技术体系。另一方面,我国在培育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同时,也积极推动传统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形成数字经济新动能新优势,“推进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升”^[19],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5 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再创新高。根据 2026 年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 年)》,我国算力规模位列全球第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0.5%,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80.1%,移动支付、数字信贷位于世界前列。持续完善数字乡村建设体系,中央财政拨款支持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以及乡村电商和快递服务站点,拼多多、抖音等主流电商平台积极助力农特产品销售,打通农产品销路,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多渠道赋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由此可见,数字经济有助于我国更快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要做到“既保持市场活力又维护社会公平,既促进技术创新又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轨道实现有序发展”^[20]。

(二)以数字民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场域

我国数字化治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下,数字化全面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1],数字政府建设意味着,在现代计算机、网络通信等技术支撑下,政府机构日常办公、信息收集与发布、公共管理等事务将在数字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环境下进行。“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治理领域的扩展”^[22],通过数字民主的方式进一步彰显人民民主,成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政务数据共享开放,打造“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政务服务模式,有助于实现政府办公自动化和政府信息实时共享,克服传统行政方式中僵化刻板、大包大揽的官僚作风,确保行政高效透明和精准公共服务,有利于加强政府内部的民主化建设;另一方面,数字政府作为民主治理的重要载体,能够积极“推动数字资源的平等均衡配置”^[23]、“促进社会参与者的多元互动与协作”^[23],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并行使更多的民主权利。比如,人们可以随时在各级政务平台上查询政府信息、通过“学习强国”和各类官方媒体电子平台了解国内外最新资讯、参与电子化民意调查和社会经济统计、通过电子化平台建言献策、参与电子选举等。这种数字化治理通过技术化手段“将人、事务、数据、流程等联结起来,使现实空间和数字空间有效接榫和贯通融合”^[24],推动民主贯通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使得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能够体现人民意愿、听到人民声音,从而进一步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近年来,我国数字民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数字政府在线服务指数保持全球领先,全国 90%以上政务服务网上可办,各地积极打造智慧政务模式,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体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务云网建设,统筹 28 个政务云中心,服务 500 余个业务系统,横向接入 9 000 多个各级政务网络使用单位,纵向覆盖到村,实现基层“一表通”,覆盖 4 000 余个部门,显著提升当地基层治理效能。这表明,我国数字化民主实践“在守好‘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顺应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精准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要义,满足了人民追求美好政治生活的时代召唤”^[25],为“数字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政治保障。

(三)以数字文化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精神内核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所推进的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是精神生活以至全部生活的全面富裕。”^[26]⁶⁷ 其中,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和精神力量,正是实现精神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要传承弘扬包括悠久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以及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优秀主流文化。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创新主流文化传播形式,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另一方面,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创作,推动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近年来,国产电影《哪吒》《姜子牙》《大鱼海棠》《齐天大圣》的热映,电脑游戏《黑神话:悟空》的一鸣惊人,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推出的数字化体验,无不体现出

我国数字文化的蓬勃生机与广阔发展前景。由此可见,数字文化不仅作为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全新业态,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提升人民精神力量的重要途径,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内在发展动力。

近年来,通过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我国文化成果在数量上更加丰富繁荣、在质量上更加精益求精、在传播途径上更加多样便捷,新业态、新场景不断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文化传承方面,文物数字化、古籍数字化与数字技术赋能考古和文物修复等领域涵盖多领域、多层次的丰硕成果;在文化创作方面,网络文化创作不断增长,用户规模不断壮大,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网络视听作品;在文化产业方面,云音乐会、云展览等文化新业态占比提升,线上文化消费丰富多样,数字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显著;在对外输出方面,我国数字文化产品海外影响力增强,文化贸易模式升级,形成了从知识产权(IP)到平台,再到产业链输出的新特点;在网络空间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中国联合展台在线平台》《丝绸之路数字遗产与旅游信息服务平台》等为各国文化交流拓展了渠道,推动各国文化交流更加深入广泛。

(四)以数字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现代化价值诉求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领域的具象形态,我国以数字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现代化价值诉求,积极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自古以来便崇尚“和合”、推崇“集体”的道德传统和价值理念,其深刻底蕴持续浸润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着21世纪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追求建设和谐世界”^{[26]93},依然始终承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价值指向,秉持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情怀,立足于全球视角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更加丰盈的表现形式,可将这种基于数字化手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核的新型共同体称之为“数字命运共同体”。这种“新”主要体现在形式和手段,因此,数字命运共同体依然归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之下,“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27],肩负着推动世界历史朝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趋势前进的责任。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彰显了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与当代数字技术的互构互诠逻辑,是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28]。积极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要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体系,制定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破除数字霸权和数字鸿沟,推动技术开源与合作研发,促进数字技术普惠共享;建立全球数字安全合作机制,保障全球数字安全,规范数据治理;深化数字文明交流互鉴,搭建国际数字文化交流平台;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构建开放透明的数字市场,“促进全球共享数字化红利”^[29]。这些举措事关全球数字合作的体系搭建、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以及数字文明的交流互鉴,有助于形成全面、坚实的全球数字关系网络。

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遵循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向,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数字赋能外交的方式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数字命运共同体搭建更多国际数字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开放型经济,加强同各国的数字战略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数字化赋能让国际社会更加便捷高效地共享治理良策,切实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社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26]123},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注入新的数字活力和数字动力”^[30]。

四、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

通过对比数字时代西方现代化的景观策略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路,可以发现,两种现代化逻辑

背后蕴藏的实质分别为资本逻辑与人本逻辑。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经济垄断、政治专制、文化单一与社会关系分离,是根源于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等资本逻辑在各个领域作用的一系列现实反应。这种“单纯从商品生产和财富增殖着眼的‘物本主义’,忽略了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社会关系在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忽略了经济与伦理、社会、政治的整体性问题”^{[9]181-182}。而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则实现了人本逻辑对西方资本逻辑的全面超越,“它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背后呈现的实践合理性、关系思维、共同体思想,不仅表明它对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积极占有,更表现出对其的历史性超越,展现了建构性文明的特质和新文明形态的样貌”^{[26]190}。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永恒持存之逻辑运行中根本矛盾的彻底超越,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解决方案”^[31]。具体来看,以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为核心,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景观社会的超越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人民当家作主对统治阶级专制的超越;文化自信对价值规训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社会内在分离的超越。

(一)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

当代西方景观社会所映射出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发展逻辑是以物质和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载体而存在。“在西方现代化条件下,资本是用‘物’的外壳、等价交换的抽象价值形式掩盖着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生产关系。”^{[26]255}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自始至终“所要追求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最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26]63}。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中国式现代化拥抱数字技术、推进数智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在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的赋能作用也日益凸显,数字生产力在多领域激发了数字新业态发展动能”^[32]。更多社会群体融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的生产生活体系,就业机会和收入显著增加,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人们通过接入互联网,进一步丰富了日常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摒弃资本逐利的单一导向,积极鼓励和支持非资本属性的共享平台的搭建,例如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中国科技网等,这些数字平台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以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生产生活为目标。可以说,与西方资本主义景观社会所依赖的资本逻辑不同,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积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底色,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能够“驾驭住资本,防范资本无序扩张”^[13],将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超越。

(二)人民当家作主对统治阶级专制的超越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在不同层次上逐步与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接轨,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在现代政府统治和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彰显。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来说,“区别于过去资本逻辑的‘血雨腥风’,当代资本逻辑日渐穿上民主、自由和繁荣的外衣,妄图更好地突破逐利束缚,满足其贪婪本性”^[13],而数字景观的日常生活布展便为其加强专制统治、推行伪民主策略带来了便利。反之,我国则将这种接轨作为一种机遇,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充分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与西方资产阶级统治者利用数字景观实施监管和控制、转移社会矛盾、加强政治推销、进一步集中权力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加快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建设,以数字化为中介和平台进一步彰显人民当家作主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确保人民依法通过民主协商高效参与国家治理、社会事务及经济文化建设。与传统地理空间政治公共领域相辅相成,网络空间政治公共领域的构建使国家政治生活更加日常化和亲民化,使人民能够更加便捷地了解国家政治事务、监督政府

行为、积极建言献策,有效融入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如果说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是围绕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运作,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那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则始终以全体人民的根本福祉为核心奋斗导向。在数字时代,中国共产党依然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数字化为中介和平台广泛倾听人民意见、集中人民智慧、接受人民监督。这不仅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数字专制统治的超越,更有助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促进我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33],建设更高水平的民主政治。

(三)文化自信对价值规训的超越

与西方资产阶级借助数字景观的日常生活展演,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达到价值规训的目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则抓住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使得“数字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便捷条件,其不仅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还促进了文化内容的创新和再造”^[34]。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数字化赋能文化发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历史积淀和当代实践创新”^[35],引领当代中国人民“在增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中进一步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35],以新技术、新形式促进优秀主流文化的传播与发扬,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作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种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以及伴随历史发展而不断衍生出的各种优秀文化,成为中国人民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和源泉。近年来,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文艺作品蓬勃涌现,并收获广泛社会反响与市场口碑,例如2025年春节档上映的电影作品《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作品并不单纯标志着一部电影的成功,其背后更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力以及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将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创新创造能力。这一切都植根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而这又将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反观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擅长通过塑造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来传播其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试图在全球推行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输出的隐性霸权。现实证明,面对数字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中华民族用其独有的文化自信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规训的超越。这种文化自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精神支撑”^[36],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时俱进,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社会内在分离的超越

在数字景观的日常生活展演和整体统摄之下,主体内在于同一性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分离以及主体日常生活本质的分离都表征着一个内在愈发分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这种分离意味着人的主体性持续消减,其背后的资本逻辑将人从特殊的商品进一步降格为漂浮在虚拟空间中的数据商品。而“中国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视域,将注意力转向追求人的发展即人的现代化”^[37]。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讲,人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人的主体性突显的过程”^[38]。对此,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构建始终坚守人的主体地位,将维护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作为数字时代大国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其背后体现了我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和决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我国积极传播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社会内在分离的现实超越。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文明不是某个或某些国家独有的文明,而是人类共同创造和拥有的文明”^[39]。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数字化的发展应该更好地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应该推动世界各国人民更紧密地联系和团结,应该更有效地治理和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应该充分保障民众的数字权益、维护社会数字正义,应该提升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和幸福感,而这些都是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追求,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其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全球性难题与化解全球性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力量。”^[40]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桥梁和纽带,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结起来。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紧紧把握数字时代的历史机遇,通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大步迈进,“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界定现代化的未来向度与普遍关怀”^[41],不断向着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力前进。

[参 考 文 献]

- [1] 韩庆祥,张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范式:系统为基的“主主平等普惠”——基于对中西现代化哲学根基的比较分析[J].哲学动态,2023(3):5-12,127.
- [2] 骆郁廷,肖天乐.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陷阱”的跨越[J].北京社会科学,2024(2):4-11,34.
- [3] 廖胜华.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中国之治的价值理念——基于中西现代性观念对比的审视[J].学术研究,2021(12):84-89.
- [4] 周梅玲.破除西方现代化困境的中国逻辑[J].理论视野,2023(10):62-67.
- [5]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6]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 [7]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 [8]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M].梁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9] 彭国华.中国式现代化的智慧与方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10]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11] 王卫华,宁殿霞.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数据幻象:表现形式、主要影响与消解进路[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81-92,302.
- [12] 王文,陶厚兴.数字资本拜物教的哲学反思——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视角[J].学术探索,2025(3):80-89.
- [13] 沈承诚.中西方现代化的逻辑区隔与表征差异[J].世界社会科学,2024(5):22-35,242-243.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祝林林.数字经济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机理、现实问题与实现机制[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1-9.
- [16] 周玉祥.数字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J].南方论刊,2024(10):14-17.
- [17] 马海波,张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价值意蕴与路径探索[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69-73,121.
- [18] 陈蕾伊,朱梦琪,孙彦国.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5(12):181-184.
- [19] 姬静,刘玮琼.人工智能、产业链现代化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6):68-74.
- [20] 张永刚,黄宇欢.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数字经济发展的三重向度[J].河南社会科学,2025(6):23-30.
- [21] 祁志伟.“技术-组织-环境”视角下的数字政府建设[J].理论探索,2025(2):85-93.
- [22] 赵津平.技术嵌入、组织调适与制度变革:基层政府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以“巨好办”综合管理平台为例[J].领导科学,2025(3):143-151.
- [23] 朱玲琳.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数字鸿沟弥合[J].行政管理改革,2024(11):56-64.
- [24] 岳奎,曲秀玲.空间载体的演进:数字技术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J].学习与实践,2024(12):13-21.
- [25] 王新刚,王煜尧.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民主观[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5-13.
- [26] 赵剑英.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 [27] 王发龙.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特质与时代价值[J].长江论坛,2025(1):67-74.

- [28] 马立志. 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人类生存境遇叙事[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2): 85-94.
- [29] 邢丽菊, 杨惠迪. 全球数字治理: 形势、挑战与中国方案[J]. 世界社会科学, 2025(2): 46-63, 243.
- [30] 宋建丽, 李樑. 国际数字治理的风险挑战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5(3): 73-78.
- [31] 杨增崇, 张浩一.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J]. 东岳论丛, 2024(10): 141-151, 192.
- [32] 陈桂生, 吴合庆. 数字新质生产力何以推进共同富裕——基于数字赋能与数字平权的解释[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4): 131-143.
- [33] 郭婕, 李晓睿.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 发展现状、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J]. 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 2025(2): 66-74.
- [34] 严孝珍. 数字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原则、要素与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5(3): 155-161.
- [35] 冯刚.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育人价值[J]. 思想教育研究, 2025(1): 91-97.
- [36] 孙静宜. 论文化自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机制与注意事项[J]. 大连干部学刊, 2025(3): 80-86.
- [37] 王可初. 现代化与人的解放关系探究——基于“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视域[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1): 18-27.
- [38] 陈欣.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主体性提升逻辑[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16-23.
- [39] 贾经铭, 张瑜.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2): 78-84.
- [40] 刘同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及其内在关联[J]. 南京社会科学, 2025(1): 1-9.
- [41] 张利.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在全球化竞争背景下的挑战与突围[J]. 湖北社会科学, 2026(8): 41-51.

The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ver the Western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in the Digital Age

Wang Luchan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capitalism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The spectacle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modernization is further manifested in the order construction and daily-life performance of digital spectacles. Such digital spectacles embody paradoxes of freedom versus monopoly, democracy versus autocracy, pluralism versus monolithism, and integration versus separation at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social-relation levels. In the digital age, China has blazed a distinctiv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whole in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igital-technology-enabled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digital culture and the digital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hina has achieved transcendence over the Western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which is centered on the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with the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logic as its core. This transcendence is concretely reflected in: the transcendence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over capital-centered development; the transcendence of people being masters of the country over the autocracy of the ruling class; the transcende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over value discipline; and the transcendence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ver internal social fragmentation. At present, upholding this transcendence that demonstrate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engths helps China drive modernization through digitalization, and carrie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Digital China”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igital ag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igital capitalism

[责任编辑:左福生]